

論壇：學術「國際化」的得與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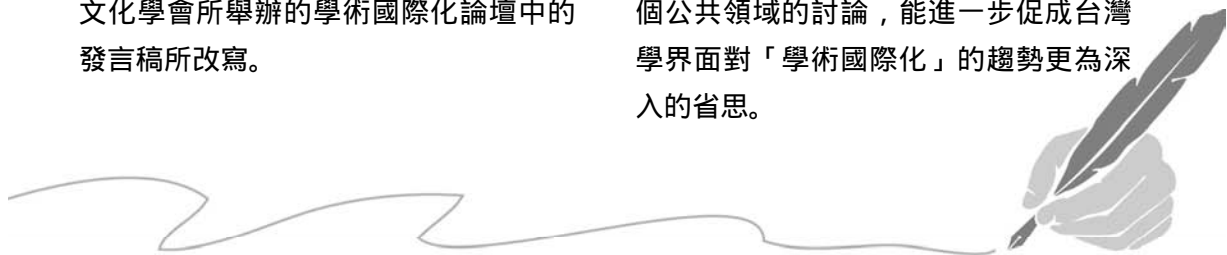
前言

# 學術「國際化」的得與失？

近年來，台灣學術界由上到下，要求「國際化」的呼聲愈來愈高。隨著各校系所評鑑制度的建立，國科會委託學者所進行各領域中每一個單位TSSCI與SSCI出版篇數的評鑑比較，這些學界內部的改革，不僅影響到青年學者的升等與學術生涯發展的思維，也實質影響每一個單位在人才甄選上的考量。當然，關於「學術國際化」政策趨勢的褒貶之聲也隨之而來。在這個專題中，編者邀請不同領域、立場互異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來檢視這個攸關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重大政策。

國科會經濟學門召集人、也是社科中心負責人管中閔院士的文章主要是揭示這個政策背後的改革理性，台大外文系張小虹教授則從文學與文化研究的角度點出語文轉換所涉及的不只是技術性的翻譯，更是主體的差異。中研院社會所張茂桂教授則從SSCI的實質影響力出發，反省這樣的政策評鑑所可能造成的扭曲與偏差。這三篇文章為三位學者在文化學會所舉辦的學術國際化論壇中的發言稿所改寫。

當然，即使在人文社會科學中，面對「學術國際化」的趨勢，不同學科的處境與挑戰也絕不相同。編者邀請了幾位國外學者共同參與這個專題的討論。美國威廉馬莉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的鄭敦仁教授以及大衛森（Davidson College）學院的Shelly Rigger教授則分別從英語政治學的研究與出版來檢視台灣研究在不同歷史階段的貢獻。在其間，我們清楚地看到「台灣經驗」本身的流變，是如何影響台灣政治學研究在國際出版領域中所可能的貢獻。新加坡大學社會系K.C. Ho（何光中）主任則從全球化、亞洲學術排名等制度面向來看這個影響亞洲許多人文學術科系的新趨勢。相當有助於我們理解台灣內部的政策思維，並不是台灣僅有的獨特現象。他的文章也指出這些政策為學術環境所帶來的新危機。最後，中研院民族所黃應貴所長則回歸人類學本身的台灣脈絡，以人類學為例，反思「本土化」與「國際化」所應有的作為。編者感謝這幾位學者的慷慨贈文，也期待這個公共領域的討論，能進一步促成台灣學界面對「學術國際化」的趨勢更為深入的省思。



論壇：學術「國際化」的得與失

## 一、論壇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管中閔

中央研究院經濟學研究所所長

# 學術國際化 與學術進步



**基**基本上，我並沒有認為學術國際化有其絕對必要性，所以我想談的是「學術國際化與學術進步之間的關係」。但是我必須要先承認，我自己本身是學社會科學的，因為學科領域的不同，所以與不同學門看的問題、或理解的許多東西也未必相同。所以我希望以下討論的東西，能儘量符合大家期待想對學術國際化的理解。由於我對教育方面屬於外行，所以只侷限在學術研究來談，不包括教育，也不包含文學和藝術的創作部分。

在學術研究的部分，我個人認為，學術研究的精神，如果我們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講，就是創新或原創。如果沒有創新、沒有原創，而純粹只是資料的整理、或一些材料的堆積，這些在我來看都不是屬於學術研究真正要做的事情，它是學術研究裡的一部分，但不會是學術研究中最主要的部分。

進一步來看，學術研究的目的是希望能解答一些未知的問題，從中創造出新的觀念和方法，甚至新的工具或儀器。我想這樣簡單的綜合性敘述，或許不夠周延，但在某些程度可涵蓋了不同領域對學術研究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我認為學術研究的核心價值，是在於學術進步本身。換句話說，學術研究本身可以有工具性，但未必一定要有工具性。因此，學術本身能否創造學術進步，是學術研究的核心價值。

既然談到學術進步，我認為，學術要進步，或是比較快的進步，應該來自於更開放的討論，更多人的參與，而不只

是關在一個小的地方；在一個小的範圍內學術也許會進步，但進步相對來說是緩慢的。

綜合以上，我認為我對學術研究的基本看法是，它的精神是創新，它的目的是發展新的東西，它的核心價值是學術進步，而進步來自於更開放的討論。

接下來再進一步討論學術國際化的部份。我在上面提到學術重要的部分在於其創新和發展的成果。既然是創新和發展成果，我認為需要在更大的學術社群接受檢驗、接受確認。當我們有了一些新的看法或結果，如果放在更廣大的社群中間，會發現未必是新的。我們自己想到的、發現的一些新的東西，一定要放在更大的場域中去檢驗，才能確認他們是否真的具有創新性和原創性。因此能夠在廣大的學術社群中接受檢驗和確認，一直是學術研究中很重要且基本的工作。而這無可避免的，就會聯繫到學術國際化。我在上面也提到學術的進步主要來自更廣泛、開放的討論，也唯有在更大的學術社群裡接受批評、接受挑戰、接受質疑，學術才會更加進步。

我想，將這兩點結合在一起，我們就可以發現，學術中間至少從我所講的幾個觀點來看，我們在學術研究上似乎並沒有必要把自己侷限在一個相對小的學

術社群裡。

在早年、在更早的時代，受限於通訊工具的限制、地理環境的限制，我們也許不容易把我們社群或討論的空間放大，但這些問題現在顯然都不存在。那我們要使學術更加進步，或能使學術的創新性得到更多的確認，或者更大的啟發，我認為走向國際化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因為只有在這上面，我們才能真正的讓學術接受到各方的質疑挑戰，使它更快地進步。所以我在這邊強調的是學術國際化的重要性，而非必要性。因為學術研究的從事者畢竟是人，每個人的心態不同，每個人要選擇什麼樣的形式來呈現他學術研究的成果，取決於這些從事研究者的心態，所以沒有什麼必要說學術一定要國際化。但我前頭所講的就是要告訴大家，學術國際化的重要性，就是因為你可以參與並介入更廣大的學術社群，從而使自己的學術研究得到更大的確認、得到更大的發展。甚至我們以前看武俠小說，常提到華山論劍，從學術國際化的角度來看，重點不是華山，重點是在論劍，在更開放的討論。當然可以把自己關在少林寺、華山裡頭自己論，但更好的是走出去和其他人一起論。

既然講學術國際化，我們很自然地會聯想到，長久以來都有學術國際化相對

於本土化的爭論。我們剛剛提到學術研究取決於研究者的心態，要選擇什麼方式來呈現自己的研究成果；用什麼方式去接受別人的批評。在這裡我覺得國際化、本土化、甚至個人化，都是大家自己的選擇，這中間沒有必要性。如果一個人選擇了他自己做好的研究成果就鎖在箱子裡，到死了之後就埋在棺材裡，我想這也是他個人的選擇，這對我一點都沒有影響。但如果要談學術國際化、本土化的話，我們就要確認，學術的判準，從來就不應該是用這種方式來區分。學術的判準就應該是學術的創新。我們既然承認學術研究的精神是創新的話，那就應該看研究成果的創新程度、研究成果的顯著性；是不是國際化或本土化，事實上不應該是區分學術研究的一個標準。因此我也覺得若要今日還要繼續爭論是國際化或本土化那一個重要的話，根本上是搞錯了學術研究的核心價值。當然我也理解，這麼多年來對學術國際化有許多的批評，其中我覺得一部份其實不是對學術國際化的批評，而是針對學術界目前所採用的一些很簡單的量化標準，譬如說SSCI，那SSCI恰巧是和國際學術發表連在一起的。所以若針對的是那一部份的批評，我會認為這些批評其實和學術國際化的本身無關。對於簡單的量化標準而引起的流弊的批評，我認為不應該被引導為對學術國際化的否定。因此我也會認為，對學術國

際化的批評，如果無涉於學術研究本身的精神，無涉於學術研究本身的核心價值，我認為那些都只是枝節的問題，而無關乎學術研究本身。

既然已經提到SSCI，我也稍微對SSCI作一些我自己的看法、說明一下。SSCI是來自於國外的研究機構所編出來的全名叫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東西，然後這個東西是將所有在其收錄的期刊上發表的論文加以統計起來列上去，所以有的期刊在上面、有的期刊不在上面，自然地就形成一定的篩選機制。因為它主要都是以英文期刊為主，因此自然而然地成為學術國際化的一種指標。但是SSCI除了是把這些學術發表的論文用量化形式整理呈現出來外，它可以視作學術國際化的指標，但是它跟學術卓越、學術進步事實上無關，所以不能用來當作學術卓越、進步的指標。如果要用SSCI來做學術評量，我當然也認為它的確不是非常好的學術評量的標準。但是我們仔細想想，不管任何事情，天下又那有完美的評量標準？事實上你只要訂出任何的標準，我相信都可以舉出一些反例來說明這些評量標準不恰當的地方。所以去追究SSCI是不是一個完美的評量標準，似乎也不是重點。我們當然不必因為學術界中的某部分人，甚至某些負責學術行政的人，對SSCI標準的誤用、甚至濫用，而全盤否

##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定SSCI的指標功能。或許有的人說，使用簡單的量化指標，無法正確地區分或評斷學術成果的好壞，更好的作法是對學術研究的成果作非常精細的質量評鑑。譬如說，我們同樣有一份學術研究，我們與其看這個人的vita上面的publication index，倒不如找幾個人來，很仔細地讀他所有的作品，從數量到品質上都能做一個更深入的評鑑。這當然是非常好，但我要說，這是非常理想的作法。但今天在整個學術界，不管從升等、續聘、到國科會各種執行的制度之下，這種理想性的作法，最多只能成為理想，在現實性上是不可行的。我們很難想像每一份、每一個人的學術成果都要動員龐大的人力和物力，來進行評鑑，這是一個簡單的成本效益問題。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我現在在經濟學界，我認識的一些經濟學界在國外學校，美國一些top學校的人，他們從來不費事去找其他學校的人去 employ 他們的新 faculty，我曾問過他們類似的問題，難道你們認為只有 Top 10 的學校才是最好的嗎？只有那邊的人適任到你們學校來教書嗎？我們當然相信別的學校也會有人寫出很好的博士論文，也適合到我們學校來教書，但我們沒有辦法花那麼大的資本去搜尋這樣子的人。所以我們相信會有遺珠之憾，但這也是成本效益的問題。他只願意在他已知的成本之內，去找最適合他們的人。所以對

SSCI我也可以用如是的眼光來看。你用它做一個標準，好過沒有標準。用 SSCI 的確沒有辦法看到一些品質的部分，但是站在執行的層面上，有時你得到一些方便，也要付出一些代價。這是我的看法。

最後我想談一談對學術國際化和學術進步的看法。我認為走向國際化的確對我們的學術進步，發展我們自己的學術，有絕對的正面作用。我也一向認為，台灣很小，可是我們的心胸和視野不必很小。而學術研究的世界很大，我們即使全力以赴，都未必能看到學術全部的面貌，也未必能探討到學術精微的地方，所以我認為學術國際化或是不是需要國際化，如果是枝節的部分，也許都不是我們應該關心的重點。

論壇：學術「國際化」的得與失

## 一、論壇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張茂桂

# SSCI與學術的 「認可」問題



**我**想最近常看到一些關於 SSCI 的討論，其中有些相關論述與表達，讓人擔憂將改變台灣的知識生產方式以及知識生產課題，促發想要知道 SSCI 到底是怎麼做成的。避免我們在弄不清楚 SSCI 到底代表什麼，就一味的追求，或者用以代表有「認可」的學術成果。

和這相關的問題，是建立學術社群以及評鑑的問題，而對於 SSCI 的莫名看重，直接涉及到長久以來所謂學術社群「國際化和本土化」的辯論問題。鼓勵向 SSCI 蒐集的刊物投稿，代表一種國際化、參與國際學術競爭的成就。我其實

在稍早時，在比較屬於社會學的觀點裡就曾提過，國際化和本土化的對立，其實是一個策略性的問題，不是實質的問題，如果真要深入看，其實所有傑出的社會學，除非是跨國比較研究，幾乎都是從「本土」社會學出發。而所謂國際的社會學，大部分時候，也就是用英文、法文寫的社會學，也是關於英美或者法國、歐洲的「本土社會學」。如果從社會學到中國以及台灣的歷史過程來看，事實上，經濟學和政治學也差不多，都和國家民族所面臨的現代化或西化浪潮脫離不了關係。所以我們早就在朝向國際化（以西化為代表）的途中，只是我們現在談的國際化策略跟十九到二十世紀初期時是不一樣的。當時我們借用社會學或經濟學看自己社會的問題時，是把它（們）當成有效的科學工具，來作自我社會的體檢、甚至藉勢進行自我改造的工程。我一直認為我們應該把知識生產過程當作脈絡化去看，不要當作國際化和本土化的對立，而是知識生產的策略運用問題。現在談的國際化，英語化，是策略性的一種轉變。

##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我還記得1970年代初期我們在台灣大學社會系唸書時，我們大二的英語教學的課本就是社會學，所以社會學是和英文一起學的，一邊學英文、一邊念社會學。我們當時就認為，社會學就是應該要這樣，一定要向西方學習、甚至用英語去討論自己的想法。其實，社會學裡面使用的英文，往往是蹩腳的、非文學的幽雅英文。而用讀英文的方式來讀社會學，又會去弄文法、片語而疏漏真正的重點。

在這樣的氣氛下，當時我們都已經有了一個懷疑，大部分同學一直到大學四年畢了業，還是不瞭解社會學到底是在研究什麼。因為我們的教科書全都是「關於」歐美社會的知識，我們沒有那個文化背景以及基本關心，不懂得別人的提問對象，甚至無法理解他們的基本出發點。比如我們常提到，韋伯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大家都知道這是重要的經典，社會學理論幾乎一定會提到，學生也都一定要研讀，但是台灣人讀了老半天，可能根本不知道基督新教倫理的真實社會是什麼？除非我們真的有機會去接觸到那個西方的基督新教的社會，或者在台灣非要是長老教徒，才真的有可能瞭解，也才知道基督新教裡這些東西和資本主義是有關係的，所以有相當大的隔絕。反過來說，當時我們如果有人寫關於「媽祖崇拜和中小企

業精神」，或者這一類的「本土課題」，大家一定會更容易瞭解。

事實上，1970年開始，台灣的社會科學界，有一個重要的學術典範的建立工程，這個工程簡稱為「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趨勢，這個本土化的趨勢其實就是對於我剛剛所說的那種對於西方的距離的反省。就是當在研究自己社會的時候，學者發現有障礙，不能一昧地以研究別人的理論和研究途徑來瞭解自己的社會。這個社會學的本土化當時叫做「中國化」，中國人的性格的研究、中國人的現代性的研究當時領導的那些人都還在，比如楊國樞、李亦園、文崇一幾位先生，年輕一點的如葉啟政、高承恕，他們都是有很深刻的反省性。你說他們不國際化嗎？其實不是，他們其實有很多國際性的資歷。但他們有一個研究的策略和關懷，就是說，我要如何去瞭解我們的社會。這裡面「文化特殊性」是一個重要問題、語言也是問題，還有更重要的，就是提問題的方式會不一樣。如果你不這樣子去追求知識，沒有反省力的話，永遠只是在套用別人的關心，別人的理論，複製一些「區域」研究而已。

談到這邊，最近聽到高承恕教授講到他自己的一個故事。高承恕教授對我們年輕人的影響力很大，他是台灣最早創

造了韋伯熱、也是台灣最早創造布勞岱研究熱的社會學者，但是現在他在研究台灣的股票市場，把股票市場當成一種經濟行為、社會的集體參與、操縱以及權力支配關係。他這個轉變是從哪裡來的呢？根據他自己的說法，好像是在1987年時，他原本都在高談闊論社會學的理論、流行思潮，而台灣正好發生「十信」風暴，國民黨立委蔡辰洲經營的信用合作社被淘空，當時先得到風聲的大戶包括官員家屬在內，都在事發前把錢提走了，造成雪上加霜的資金壓力，而散戶小老百姓的存款則全都被倒帳，它們四處陳情抗議，而這在戒嚴時期，直接挑戰不能集會遊行的規定，鬧成社會很大的風波。當時有一位做歷史社會學、經濟社會學研究的學者 Gary Hamilton（現在是華盛頓大學社會系教授），正好在東海大學訪問。Hamilton問高承恕，這個十信風暴是怎麼一回事，也就是台灣的政經關係問題，金權政治問題，高教授自己形容當場傻眼在那裡說不出來。當人家在問台灣社會大的relevant issues時，做為一個弄大理論的社會學家，高承恕感慨自己居然一句話都沒得提供，進而就改弦易轍、開始做所謂的經驗研究，就帶著他的學生去做中小企業發展、地方派系與金權政治的發展的研究。

這個例子是說，我們不能永遠停留在

複製、翻譯一些理論和概念，必須真正去面對你的社會，去思考你的社會的議題，建立研究的relevance，這就是一種反省性，我們姑且稱之為本土化，這不是用來和國際化對立的。而是說，對於一昧地西化，或者，只是過去一些偏頗的研究取向想法的積極反省。

其次，我要來談談SSCI。我剛剛有談到為什麼這會讓我感覺到有一些困惑以及擔憂的問題。最近這幾年可以看到有一些學者，開始在自己的履歷和出版品後面加上這是SSCI的字眼，你在網頁上也會看到有加上括弧。意思是說這是被「認可」的，等於說是一種正字標記，告訴大家有一種識別作用。碰到比如說，在Issues and Studies出版的同事，他會進一步註明：這是「台灣唯一被SSCI承認」的刊物，其實Issues and Studies的確是被蒐集進去，但是把它說這是「承認」，我們就要進一步問，為什麼是「承認」與「不承認」的問題？難道說，Issues and Studies是台灣學術成就被承認的刊物嗎？我想即使Issues and Studies的編者，也不會這樣宣稱。既然不是，那麼，這應該是SSCI蒐集者的問題，而不是台灣學術成果的問題。

過去對我來說，SSCI所提供的資料庫，就是一個很好的蒐集文獻的地方，如果在上面找不到，我就得很麻煩地要

##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到圖書館去找，去搜尋紙本。我不清楚什麼時候SSCI從一個資料庫變成一個正字標記，這個問題我覺得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一個大問題。很明顯地，這對我們學術研究有幾個影響，一個是學術單位考評內部的標的，為了評比要實用，要看有沒有好的出版品，在好的學術期刊上出版，但是一般學術領導人在面對各種不同專業與領域的評比時，常無法進行實質評比，所以就拿SSCI來，當作一個門檻。第二個就是，它不只是內部評鑑，還包括了組織和組織之間的評鑑。比如管中閔教授認為，學術要進步就是要創新，而創新就是要被評鑑。要競爭，剛剛有提到就是要參與更大的community，彼此之間要競爭，因此就要有排名。為了要有比排名，就要有「客觀標準」，而SSCI就很便利地被用來作為一個門檻。台灣自己的重要學術資源分配單位，如國科會，也在建立自己的TSSCI。這裡面還有其他的情境可以談，整個來說，不只是SSCI借用的範圍很廣泛，有一些大學在系內的評等或薪水調整時，會將此納入考慮，所以促發我想瞭解的動機。

目前找到一些資料顯示以下幾點，第一，SSCI自稱有一個科學理性的基礎，基本上就是大部分重要的科學概念，經常出現的只在少數的journals裡面，你只要掌握少數的journals，你就能掌握科學

的發展，大致上是如此。這可以類比為統計上的所謂parsimonious原則，用少數的期刊，就可以知道學術發展的現況。所以建立citation index，在目的上，是科學研究者希望用來捕捉科學發展的進程，以及掌握各個學科領域裡概念的相互連結性。但是在當時1958年代，並不知道這有什麼商業利基，當時的leader叫做Eugene Garfield自己拿出五百元美金，就自己創立了ISI(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當時的資訊科技相對今天來說，其實是非常落伍的，所以不可能收集廣泛的資料，收集資料的人工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並沒有顯著的影響。最早出現的是以自然數理科學為主的SCI，社會科學的SSCI應該就是模仿SCI出現的，它是在1972年公諸於世，仍然沒有提供給一般人使用。一直到PC出現後，到1988年才開始有磁片版；等到1990年代後期，因為網路普及，才益發顯得重要。現在ISI已經被另外一個叫做Thompson Inc的大公司買去。它是一個很大的資訊公司，在2001年所創下的收益是七十二億元美金，所以我們今天所講的SSCI，是一個大公司裡的眾多資料庫之一。其目的從一開始的科學發展邏輯，到後來已經變成是商業邏輯。

而它現在做的是什麼事呢？你可以想像現在的information科技，資料庫的成

本相對便宜，資料的搜尋使用也更簡易，無須依賴一個高度門檻來過濾，因此其資料庫必然是愈作愈大。的確如此，目前已顯示出，估計共有2000個社會科學的期刊，其中百分之八十五的文章都在裡面，而百分之九十五的citations都在裡面。我甚至認為這個數字如果接近百分之百都不是問題，剩下只是成本的問題，而成本也勢必會不斷降低。我看見社會學裡也有九十多份刊物，其實就我來講，很多我也沒有聽過，有些是新的、有些是因知識不足而沒有聽過，所以真的要在這裡出版，SSCI的選擇是愈來愈多、愈來愈擴大，本身就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把它當成正字標記被認可，是很可議的一件事情。

其次，我們要看，它是如何進行選擇的呢？它考慮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個很重要，在商言商，公司自稱會非常注意quality，但沒有說明如何注意quality的問題。事實上，這是一個敏感的議題，相信一個以營利為目的的Thompson公司，也不敢輕易公開宣稱，所謂quality是什麼，以免自暴其短。其實有些刊物，我至少可以指出一份刊物，很明顯地看出並沒有人引用。

但是資料庫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它提供了一個impact factor。簡單地說，就是一份期刊刊物內的文章，在出刊一至

兩年內平均被引用的次數，次數愈高，表示刊載這篇論文的刊物愈重要。你要去算文章的重要性亦可，但基本上，SSCI是給刊物本身的ranking，不是給研究者的ranking。給研究者的ranking，是另外一種使用的延伸。一般說來，impact factor數字愈低，表示這刊物的citation就愈無用。這組資料庫的商業契機是在哪呢？主要是圖書館、出版商。圖書館的經費有限，要買期刊必須要有選擇，所以必須看刊物的影響力。如果是出版商，它要知道學術發展的近況，最新「流行」的東西，或者正在退出「市場」的課題是哪些？當然對急於想發表的作者來說，也是一樣重要，他可以知道哪些題目是目前大家在討論的，哪些刊物的排名如何。這個資料庫讓學術市場當然更為透明，但是不能用來替代學術品質的判准。學術品質有時候必須等候時間考驗，沈澱之後才能發現。

它有些什麼問題呢？第一個很明顯的就是英文偏見。不只有英文偏見，還有美國偏見。我們看到日本、大陸、台灣、新加坡等地基本上都沒有任何 significant journals被列入。很明顯地它不適用代表東亞的學術研究。如果是中文刊物，要進入似乎也是可以的。但是我看過他們登載在網頁上的規定，基本上所有的reference寫法都要改成英文，如何

##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改成英文呢？這好像有點困難，但是仍然可以做。重點是，在商言商，它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有什麼利益嗎？這裡有一個關於自身的例子，有一本 Sage 出版的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我的文章也曾經出現在裡面，journal 裡的這些文章是從中文翻譯成英文的，但是 impact factor 根據統計是 zero。首先，我們台灣人一定不會引用自己被翻譯成英文的文章，我們一定是引用自己的中文原文。而英語語系的人會覺得這只是區域研究的材料，不是「真正的」社會學。

而在亞洲，社會學聞名的刊物可說是一本都沒有列入 SSCI，連日本也沒有，印度有一本，但是那是跨國公司 Sage 出版的，韓國則有一本 Asian Women Studies。

第二，impact factor 的計算受到母體影響很大，本身雖可提供一個 ranking，也會產生另外一個問題，第一個就是蒐集偏見，我們台灣人寫的文章基本上是 no impact，根本不可能被算入 impact factor。因為刊物原本就不被收在裡面，所以不可能產生 impact。所以台灣說要建立 TSSCI，或許可解決這個問題。第二個是人數少的問題，如果你扣掉 self citation（期刊內的自我引用）的話，像

impact factor 幾乎都是非常微薄的。因為人數少，所以會引用的都是互相有關係的一群人自己在引用。所以這裡有社群尺度的 bias 存在。

我們接著來看，強調 SSCI，對台灣會有什麼影響呢？有一位國內教授曾經在網頁上主動提供在 SSCI 發表文章的經驗。他曾經當過是很多刊物的編輯，所以對於出版策略看得很清楚。但是他所談的學術和我們說的學術創新，是完全不一樣的。他所談的學術就是一種商品生產，就是如何蓋上 SSCI 的 mark 的知識。他在網頁上非常無私地告訴你，你要搞清楚各期刊的性質、偏好、和規格。還要搞清楚哪一些是 SSCI，那一些不是，免得「投資報酬率」太低了。他很清楚的告訴大家這個「遊戲規則」的策略使用，但我不知道這跟學術有什麼特別的關係。你可以說要追求真理、新發明，但是在日常的學術 practice 裡面，遊戲規則是很現實的。一個助研究員、助教授要出版時，要常想到如何被認可，而認可我的人，通常是不懂得我的專業的人。這變成非常真實的學術生活裡的一個現象，如果你不把 SSCI 代表的含意弄清楚，你就會產生一些奇奇怪怪的玩遊戲的作法與想法，喪失對於學術追求的誠懇與深度。

我簡單地歸納一下，本來學術進步的

一個原因是透過嚴格的審查，參與國際、其他地區的publication，也是要經過嚴格的審查。但是用SSCI來作為一種正字標記的話，第一個有英文、美國的bias，既然有語言的偏見的話，其實不用說，所有文化研究的同仁都可以告訴大家，這裡同時會有文化的偏見，也有科學的偏見，就是科學理性的偏見，認為是可計算的。另外還有期刊的偏見，它只計算期刊，不計算書籍。我們也許可以花一些時間，可以舉出十本過去對你影響最重要的書籍，但是要你舉出十篇過去對你影響最重要的論文，其實相對上更為困難的。

TSSCI可以解決SSCI的部分問題，如語言、文化偏見的問題，但仍會產生偏向期刊的偏見問題。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因為它本身其實還不是一個可搜尋的資料庫，重點應該放在做知識庫的作用，而不是用來做「認可」、「排序」的作用。如果要進行排序，那麼必須使用impact factor取代現在由國科會進行的「刊物認可」工作。同時，有效的impact factor的計算，必須依賴較大的母體，以及要可能扣除self-citation的問題，所以，應該將TSSCI的門檻放低，讓更多的刊物都能夠進來，才能建立在地的有效的impact factor的母體與計算。而在支持TSSCI的建立的同時，我們也應該仔細反省，那個鼓動所謂SSCI正字標記風

潮的學術膚淺症的問題。

（這篇發言稿是經過事後修補後完成的，因此和現場記錄略有出入，特此說明。就在完成修補之時，國科會社會科學中心的TSSCI資料庫已經開放使用，預期對於以後的知識生產工作，將有很大的幫助。而在另外一方面，我繼續看到一些年輕教授在自己的工作成果的檢討上，夸夸地在談論自己在不同的SSCI出版的「成就」以及心得，得意之詞溢於言表。我很想告訴他們：請告訴我你的實質研究成績，而不是你的出版小傳，請區別學術研究者以及論文生產者的分際，請回到學術的基本。）

## 一、論壇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張小虹

# 學術國際在地化 與學科差異

「學術國際化」是晚近台灣學界的熱門話題，更是眾多學院知識份子的自我期許與切身焦慮，但甚麼是「學術國際化」的具體內容與施行方針呢？

於是一種簡化思考的方式出現了，「學術國際化」就是要用英文在國際學術期刊（以美國為最大預設）上發表文章。此思考方式的在地文化脈絡有二：一是台灣長期以來學術品管的鬆懈，嚴重缺乏客觀公正的學術評鑑體系與評量標準，二是部份學門的傑出學者，其研究成果逐漸受到國際的重視，順利地在世界知名的學術刊物上持續發表文章，在心態上便豪情萬丈地推己及人，要大家都「有為者亦若是」。於是部份決策人士便以「在國際（英文）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作為評判「國際學術化」的重要依據。

他們沒有錯，台灣學界確實亟需建立一套客觀公正的學術評鑑準則，不再因循苟且。他們沒有錯，台灣學界應該積

極參與國際學術社群的互動，不再閉門造車。但他們錯在視而不見學科與學科之間的巨大差異（不是所有研究都可以用數理模式而放諸四海皆準）。他們錯在嚴重忽略「學術語言」本身的不透明性，以為所有研究都不會因所使用的語言、所發表的場域、所對話的社群而改變。

以下便是我作為一名文學與文化研究的工作者，以親身的研究經驗出發，說明我個人為何不願以「在國際英文刊物上發表論文」為職志、為目標。這並不是說我過去不曾或未來不會在國際英文刊物上發表論文，而是想從學科差異的角度，提出此種職志與目標所可能隱含的內在規範性與圍限性。

首當其衝的當然是「學術語言」的問題，一個人可以講流利的英語、寫漂亮的英文，未必代表英文可以成為她／他的「學術語言」。語言的聽說讀寫是一回事，而是否可以用這套語言做精細繁複的思考是另一回事。對某些學科而言，

語言只是表達工具而非思考模式，所以一篇論文最初是用哪種語言構思的，並不影響整篇論文的概念發展與論述架構。這些學科所生產的論文對語言的依賴度頗小，只要簡單、清晰、達意就好，甚至可以先用中文寫成，再請專業人士代為翻譯都可。但對某些人文學科的研究者而言，我們是在語言「之中」思考，在語言「之中」發展概念，因此我們最熟悉最隨心所欲的語言，就是最具學術原創力的語言。而很不幸或很幸運的是，這種語言往往多是研究者本身的母語，而非第二或第三外語。

而伴隨著「學術語言」而來的，便是「學術社群」的互動考量。對某些學科而言，散佈在巴黎、加爾各答、西雅圖、海德堡與台北實驗室裡的科學家們，所投注發展的焦點可能是同一件事，他們可以透過國際刊物、國際會議彼此交換研究心得與成果，形成超越地域與文化限制的國際學術社群。但對部份人文學科的研究者而言，我們所關注的焦點，有時具有較強的在地文化脈絡性，並不容易（也不必）超越地域與文化限制做國際漫遊。而往往「學術刊物」是扣連在「學術社群」的互動上發展的。對我們而言，一篇投台灣中文期刊的論文與另一篇投國際英文期刊的論文，其處理議題的文化深淺度與理論繁複度必有不同，其文獻回顧的偏重點與關懷面必

有不同，其預設的讀者與對話的學術社群也必有不同。對我們而言，「在國際（英文）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所涉及的，不僅僅只是學術實力的問題，更是關於學術走向的問題。

以個人的經驗來說，我在學術研究上的自我期許，不是發表更多的英文論文，而是希望人從美國取經回來後，研究也要回來。從過去以英文發表論文為主，到現在以中文發表論文為主的轉變過程中，我感覺到的是研究議題與學術關懷的轉向，以及透過中文所逐漸發展



##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建構出的文化理論體系。我深信我現在用中文在台灣發表的論文，比我過去用英文在美國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更具思考原創力與社會實踐性，更能與在地學術社群產生跨學科的積極互動。

而我更深信在台灣發表的中文學術論文，當然是台灣「學術國際化」的重要環節。不簡化與不窄化「國際學術化」的方式之一，便是積極思考如何讓台灣的「中文」學術刊物「國際化」？如何讓「中文」也被視為一種國際語言？如何加強台灣「學術社群」彼此之間的緊密互動？如何想像「區域串連」、「區域結盟」的策略性推展？台灣學術要真正具有生產力與創造力，就必許時時深刻反省台灣長期以來在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學術生產鏈」上所扮演的代工角色。「學術國際化」與「學術在地化」絕對不是「全盤西（美）化」或「閉關自守」的二選一，因為我們所追求的「學術國際化」總已是「學術國際在地化」的具體展現。只有站在這樣的積極思考點上，我們才不會將「學術國際化」所涉及的資訊、權力、產值、產量等複雜網絡，窄化為「在國際（英文）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的單一評量標準，我們才可能在嚴格要求學術專業品管的同時，也學習尊重不同學科之間的差異，不同學者研究階段性的規劃，以便開放出更具創造力與想像力的學術空間。

論壇：學術「國際化」的得與失

## 二、來自新加坡的觀點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 全球化與亞洲的 社會科學學系

作者 何光中(K.C. HO)

國立新加坡大學社會學系

翻譯 陳鴻章

國立政治大學政研所碩士班研究生

**數**年前，亞洲週刊曾公佈亞洲地區頂尖大學的排名，而亞洲地區各大學的行政主管也相當重視此一大學排名。因為，透過此一亞洲地區大學排名，不但可以了解其所屬大學在國內的排名，更重要的是在亞洲地區的地位。對於頂尖大學而言，此一排名不但是一種驕傲，同時亦可提升這些大學在各國政府、學生、教職員，以及其他大學間的地位。

大學聲譽是各學系及教職員績效的總合，此一績效是對各學系及教職員所進行的評量轉換而成。而這類的評量，可說是各大學間競爭的一部分，不但影響各大學的財政，同時將對優秀的教職員、研究生的流動造成影響，將進一步對各大學的長期發展造成重大影響。更甚者，將使各大學增加跨國的研究與學習的機會，成為各大學與日俱進步與創新的動力。



除了大學聲譽之外，之所以對大學進行評量，不外是為了大學體系，及研究機構間的資源分

配。以自然科學而言，Swinbanks & Nathan (1997) 就指出，亞洲地區迅速引進評鑑制度，並針對個人、學系及實驗室進行評鑑，主要是因應政府機構在研究投資上的分配，與期望研究成果能促進經濟發展。在英國即因為研究資源配置的需求，促使研究評量制度的建立。而這樣的制度，雖然受到相當的批評，但由於會影響資源的配置，所以是被相當謹慎的執行；合乎預期的，這樣以績效為基礎的獎勵體系，其主要的提倡者是行政主管。而亞洲地區的香港，亦已執行類似英國所採用的評量計畫。

本文所要強調的是，個人對於以上所提及的評量制度所認識的主要問題，並期望能為讀者提供更進一步探討的觀點。

## 一、評量標準的國際化趨勢

近五年來，績效衡量與評估已成為各大學的特色，因此，多數亞洲地區的大學與研究機構必須強化評量標準，設立新的評量制度並採取最佳的方式進行評量。

### （一）學系評量

在台灣、香港及新加坡，許多大學及研究機構，已著手建立外評委員會的制度。曾受過英國殖民的新加坡及香港，其評量制度的基礎，是採取對教學進行外評的英國式評量制度。然而，近年來此一評量制度，已朝向北美模式發展，其所採取的運作方式，是由較資深學者組成專門小組進行評量。這樣的發展趨勢中，更值得注意的是，新的評量制度已超越以往僅以教學評量為主，而是將課程發展、研究方向、研究成果等併入評量標準，並且朝向國際化的評量標準發展。

在評量委員會的組成方式上，也朝多元化的趨勢發展。例如，某些評量委員

會的絕大多數委員是聘自國外，而亦有某些評量委員會是由國內其他大學的學者所組成。評量委員會的組成，不論其成員是以國外學者或國內學者為主，評量委員會的制度化意謂的是：學系及研究機構工作表現的評量，已朝向由專精於某些領域的學者組成的委員會進行評鑑；同時，也因為這些評審委員的專業性，而使評審委員會在進行評審時，具有其比較的意義與正當性。評量委員會在評鑑後所提出的評鑑報告，是期望能反映學系的績效。更有甚者，評鑑報告能成為提升或改革學系績效的基礎。然而，由評量委員會所提出的具體建議是否能被落實，則取決於評量制度是否普遍的採行，且其評鑑結果成為各學系及研究機構間的績效基準。同樣地，去了解誰會關注評量委員會所提出的報告，及評量是否被持續的進行與追蹤也是重要的。而且，為了使評鑑有其效力，評量活動的執行，亦有必要將地區性壓力對於亞洲地區社會科學學系的研究所造成的影響納入考量。

### （二）教職員的評量

如同學系評量一般，教職員的個人評量同樣是以委員會方式進行。目前，不論是新任教師的聘任或教師的升等，同樣採取如學系評量一樣的外審制度。而這樣的外審制度，為評量體系注入兩股

力量。首先，是將原本過度依賴學系主管評量的情況，轉變為以集體的評量委員會進行評鑑的方式。這樣的轉變，可使評量更為持平，且可以為評鑑引進更多的相同領域的知識與經驗。其次，是為求評量的客觀性，所以採取和期刊外審制度相似的方式進行評量。這樣的方式，是以專精在某個領域的學者，來評鑑新進者或欲升等者。但是當被評鑑者是專精於跨學門或跨領域時，這樣的評鑑方式將有其不足與缺失。

為了發展更為有效的評量制度，各大學的行政主管更關注學術期刊的學術聲望。也因為如此，促成了學術期刊評量體系的發展。此一評量制度是計算各期刊論文被引用的次數，而這樣的評鑑亦發展成為一個新興的訊息提供產業。例如「期刊引用報告」，提供各主要期刊所刊載論文被引用的次數。

值得注意的是，現存的期刊引用報告是以英文學術期刊為主，建立社會科學引用指標「SSCI」。雖然，中國、香港及台灣分別建立了中國社會科學引用指標「CSSCI」、台灣社會科學引用指標「TSSCI」，但這兩個資料庫並未能和北美所發展的社會科學引用指標「SSCI」並駕齊驅，而是被視為社會科學引用指標「SSCI」的補充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引用指標「CSSCI」此一資料庫，收錄

了中國大陸出版的419本社會科學的學術期刊。而台灣社會科學引用指標「TSSCI」資料庫，收錄了在台灣出版的41本社會科學的學術期刊。然而，不論是哪一個資料庫，這些指標已成為學術期刊質量、研究者、研究機構學術表現的重要評量工具。

除了對學術期刊的重視之外，因為各大學有為數眾多的大學部學生，所以，教學評量亦更為重要。在教學評量上，已由原先讓學生針對課程進行評鑑，加入同僚針對教學進行評鑑。這樣的評量是由原先讓學生針對課程進行評鑑，來衡量教師的教學技巧與互動情況。然而，在加入同僚對教學進行評鑑後，則是除了原先的學生課程評鑑以外，同時由同僚針對教學的內容進行評量。

## 二、評量制度對學系及研究機構造成的影響

### (一) 制度性的影響

亞洲地區各大學將其評量體系國際化，其目的是期望透過評量制度的建立，進而確保較好的研究生產力與教學品質。同時，透過評量來確保其教職員研究努力的最大化，並有效的提升大學及學系的聲譽。

以英國建立的超過十年以上的評量制度為例，此一評量制度已經產生其制度性的影響。Hare比較二〇〇一年與一九九六年的評鑑結果後，指出英國各大學院校，在研究的質量上均有所提升。而採取和英國相似評量制度的香港，由法國等國學者所組成的評鑑委員會，比較香港一九九六年與一九九四年的評量結果後，同樣指出香港地區大學院校的研究質量均有明顯的提升。除此之外，其他亞洲地區國家的研究單位主管，亦支持建立評量制度。例如，根據Swinbanks及Nathan於一九九七年的報導指出，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院長李遠哲認為，台灣應該引進研究評量制度，以增加研究資源的有效配置。

在各大學及研究機構研究質量提升的同時，亦伴隨產生許多有益的研究互動。例如，各單位學者出席研討會頻率的增加，可以增加學門內與跨學門間，學者的互動與學術的交流。這樣的互動與交流，可創造更進一步的學術合作、學術研究網絡，同時可以透過跨學門的合作促進研究素質的提升與比較觀點的形成。更有甚者，學術交流與合作，亦有可促成跨國合作研究的產生。

## （二）評量制度的其他影響

評鑑制度除了帶來許多正面的制度性

影響外，仍然有許多值得大學行政主管與政府相關單位留意的議題與缺失。

在之前社會各界對於一九九六年學術評鑑制度態度的探討上，Warner（1998）指出許多公眾所提出的疑慮。這些疑慮被稱為是馬太福音效應（Matthew effect），包括制度性的重視研究，但忽略教學、撰寫教科書的意願降低、現存的優勢典範對新研究領域造成排擠效應、區域間學人流動的模式僵固。Warner（2000）指出：評鑑制度對於期刊論文發表造成有利的影響，相較之下則不利於書籍的出版。除此之外，Hare（2002）更指出：優秀的研究者向優秀的研究型大學集中的情況，正在強化馬太福音效應（Matthew effect）。並且，幾乎沒有證據可以支持，研究經費的集中必然導致較高品質的研究產出。然而，值得一提的是，Hare（2000）的觀察指出：評鑑制度鼓勵學者，從事較容易、較迅速且有回饋的研究；相較之下，卻壓抑了回饋較低且需花費較多心力的研究。

評鑑制度除了對大學體系的資源配置造成影響以外，亦對整個學術體系的各層面造成影響。在學術產物的出版類型上，期刊評等的機制將使期刊優於其他類型的學術產物；截至目前為止，僅有歷史、哲學及人類學給予書籍出版品有

較高的評價。然而，同樣的效應也將發生在社會科學期刊上，在為數眾多的期刊中，將會呈現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情況。因為當研究者有必須發表在 SSCI 期刊的壓力時，已具有地位的期刊將會獲得更多的稿件；相對的，較為弱勢的期刊將難以提升其影響力。人類學學者即指出，在投稿取捨上所面臨的困難是，如果將研究發表在地區性期刊，將可使研究有更多的實質意義。然而，若將研究發表在國際性期刊，雖然可以有較高的聲譽，但可能造成的是，其作品會被埋沒在眾多的研究或北美、歐洲中心的觀點中。

而在研究取向所造成的影響上，因為學術產能的強調，促使研究者從事能迅速進行資料收集、出版研究成果，且易於獲得回饋的研究。此亦意謂著，嶄新的研究主題或獨創性的主題，將因為被歸類為風險高的研究類別，而受到壓抑。除此之外，如經濟學、人口統計學等，具有研究團隊傳統，且已建立績效指標的學門，將會有較多的優勢。相較之下，如人類學、歷史學、哲學等，以單獨研究為主且未建立績效指標的學門，將處於相對弱勢。Craig Calhoun 即指出：評鑑標準國際化所造成的影響之一，不外是地區性應用研究的衰敗。因為應用性研究，其所強調的是對特別政策的資訊提供，而這樣的特性將使其難

以發表在具有高知名度的學術期刊。

在許多亞洲國家當中，例如台灣及南韓，學者在政府部門與學術部門間有相當的流動性。如果學者在政府部門的服務不能列入評量，那麼評鑑標準的國際化將進一步使學者在政府部門與學術部門間的流動更為困難。

除此之外，對亞洲地區大學而言，有兩個更為切身的問題是必須被注意的。首先，亞洲地區國家的首都，通常是都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同時最好的大學也設於首都。然而，評量體系將為這個既存的不均衡現象增添新的問題面向。在評量體系助長研究者的流動性後，位於首都的大學將會更為強勢。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影響，不外是因為評量體系促使具有較多資源的學系，有更強的動機去聘請最好的研究者；相對的，此將打擊處於弱勢或位於偏遠地區大學的發展潛力。

其次，全球化也意謂著，英文在國際性研討會、知名學術期刊、跨國研究團隊的比較研究上，具有更為重要的地位。即使，嘗試透過台灣社會科學引用指標「TSSCI」、中國社會科學引用指標「CSSCI」的建立，或許能平衡英文期刊所具有的影響力，但英文仍將是國際學術社群的主要語言。而亞洲地區各大學

的研究者，為了能維持國際性及地域性的學術平衡，必須以兩種語言發表其研究成果，因此增加更多的壓力。例如，國立漢城大學的社會學者，有三分之一的著作以英文發表，而香港中文大學則大約有百分之六十以英文發表。亞洲地區以商學院掛帥的大學中，在吸引更多國際學生的動機下，多數的課程以英文進行教學。例如，泰國的朱拉隆功大學（Chulalongkorn University）的東南亞碩士學程，師資是以中、泰國、東南亞地區及西方國家學者所組成，完全以英文教學。而國立政治大學的台灣研究學程，同樣是完全以英文教學。

### 三、學系及研究所的工作

在大學間的競爭及教育資源分配責任的驅使下，使得個人學術績效的評量體系更為嚴謹。然而，當此一績效評量制度，證明可以提升研究的質量的同時，如何排解由此一制度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卻鮮少被探討。在國家層次上，為維持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有必要進行研究型大學與教學型大學的劃分；同時，有必要讓教授在不同的生涯階段，能在教學與研究型大學間，有流動及替換的可能性。而應用研究必須被定位為特別研究機構的職責；同時，要鼓勵學者在特別的研究機構，與研究大學間的流動。

在學系的層次上，有必要去排解評量制度所造成的個人壓力及對學系產生的負面影響。此一績效評量制度的優點是具有明確性、高透明度，但同時也造成高度競爭的環境。然而，這樣的環境將助長個人主義，而侵蝕對任何社會科系皆相當重要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社會科學學系的工作，是需要同僚間存有良好的互動關係與人際氣氛。當一個學系因為競爭而被撕裂的時候，無法提供有創意的環境與養成年輕的心智。據我所知，目前為止並沒有任何的誘因，促使良好的合作環境產生。如涂爾幹所言：只有當人生活在社群中，人才會是道德的。因為道德存在於和群體的休戚相關中，也因此才會有違背道德的問題。假設所有的社群生活皆消失了，道德生活也將隨之消逝，因為道德將沒有任何的目標。所以，在學術社群內，我們必須留心的是學術生涯的發展，不僅限於個人的學識追逐，同時也是在學術社群內的共同成長。否則，完全採取個人主義式的競爭，其所造成的影響，將迅速的侵蝕學系的根基。